

新发现的《工人之路》：研究党史的宝贵新资料

□ 忻平 高明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上海音像资料馆将在俄罗斯采集到的各种影像资料和文字资料带回国内，其中数量最大的是2500余万字的《工人之路》，为中共党史、共运史、工运史、华人社会史等研究领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是上海文献和理论界对建党百年的重要献礼。

苏联远东的中文红色报刊

《工人之路》，1922年3月1日在苏联远东赤塔创刊（原名为《华工醒时报》，共发行33期），后迁到海参崴、伯力，1938年4月停刊。开始为半月刊、周刊，后为双日刊，每期4版，约3万字，每期最高印数达到6800份（1931年630期到635期）。最初为全俄中央职工苏维埃远东部出版，自339期开始改为苏联共产党远东边疆委员会和苏联远东边疆职工苏维埃出版，目前已知出版了1700期左右，是迄今发现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由苏联共产党主办、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主编的在海外发行的红色中文报刊。1996年，俞秀松烈士后人俞敏首次发现了《工人之路》这份报纸。经多方努力，目前从俄罗斯成功采集到第一批《工人之路》扫描件约700件，发行时间跨度在1924—1932年。

初步研究发现，该报的主编、编辑和记者，多为当时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或留学的华人苏共和中共党员。中共发起组成员及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之一的俞秀松，曾担任过《工人之路》报社副主编；早期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何今亮（汪寿华）、周达文、华林、任作民、稽直，人民司法的开创人梁柏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真报》编辑张子余，内蒙古早期革命家康根成、文学家丁山、翻译家张锡儒等人，先后在《工人之路》报社担任主笔、编辑、栏目主编等职。

《工人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在远东的舆论宣传阵地、联结华人华侨的纽带，展现了中国革命史上诸多的历史细节，通过海外共产党人看中国革命，具有独特的视角。

海外中国共产党人时刻关注中国革命

《工人之路》刊载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前途、方法、过程的讨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策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大量中国革命的人物、事件等文字。海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心向祖国、关注中国革命、坚定的理想信念成为该报的主流倾向；文体多样，如大量的社论、政论文，也面向基层刊登了许多文艺作品，有诗歌、话剧剧本、漫画、木版画等，发挥了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作用。

《工人之路》刊发了大量中共中央决议，如1925年4月8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转载党的重要领导人撰写的重要文章等，其中1929年10月8日发表的邓中夏的《呜呼！彭湃同志之死》，1930年9月26日第540期刊出“中共主要负责人投稿”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弥足珍贵。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0天后，4月23日第185期刊载的丁山《蒋介石反了》一文，犀利指出蒋介石的本来面目：“蒋介石现在已经明目张胆的抛弃革命的上海工人市民及其他各地的革命群众而投降于帝国主义和军阀方面去了……蒋介石现在与枪杀革命工人及民众的军阀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又有何分别？蒋介石反了！”稍后刊出的《蒋介石专政的南京政府》一文，亦揭露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

1930年12月第572期《中国现时革命的性质与特点》旗帜鲜明提出“此刻放在中共面前的任务，就是用武装民众，建立民众的政权来为中国领土的完整而斗争”。1932年第920期《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强调，苏维埃在中国已是历史证明必须要和不可避免必然强大伸长的制度和势力，明确指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

支持中国走自己的道路的最新《决议》

党的六大是党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由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工人之路》利用处于苏联地理和信息便捷的优势，从1929年1月30日至2月9日，连续4期做了非常详细的报道。这些关于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的记录真实的报道文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开辟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支持中国革命的选择。193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肯定了共产国际关于支持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转变的策略；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推广（泽东）良好经验”，着重强调了中国农村苏维埃、根据地、红军在反对国民党政权、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中的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决议》还特别明确地指出了党必须把工作重点集中到农村和与之相适应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在巩固而扩大的区域根据地上，建立和巩固红军；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群众革命斗争、农民运动，特别要扩大非苏维埃区域的工人罢工。

会后第三天即8月29日第701期开始，《工人之路》连续三期登载了翻译的《决议》33条内容。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黄平9月份才回到上海，向临时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临时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和“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同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农村中心”策略，就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得到部署落实。从时间来看，除去翻译和出版时间，《工人之路》应该是最早对共产国际这份决议进行报道的媒体，也是最早报导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意义极为重大。

首次发现的大批中共党史新资料

通过多日的审阅、鉴定，上海党史专家从《工人之路》中找出400余条有价值的内容，其中包括：李大钊的遗著诗歌《进攻》、邓中夏的《呜呼！彭湃同志之死》、俞秀松的《工农通讯员和下级刊物目前几个战斗任务》、北京大学师生创作的《北大之救国歌》、萧三的诗歌《八百勇士赞》，以及用上海“新春调”填词的《工农革命十二月花》等宣传革命、救亡图存的文艺作品。上述内容此前未在党史研究出版物刊登发表，可以初步判断为首次发现。

李大钊的新体诗《进攻》则是其中之一：喊一声兮，进攻、进攻，壮哉我军容！群众劳工，群众兵农，一行战线中。白日光天，花花世界，残暴贼销声。白日光天，花花世界，革命军勃兴。君不见，资产阶级途穷悲落日；君不见，第三国际赤旗迎春风。为我同胞，努力杀贼，携手入大同！为我同胞，努力杀贼，携手入大同！这首《进攻》每段前半段重复，以为铺垫；形式和文风与李大钊的其他诗歌一致；完全采用白话，韵律和谐，有节奏感，是“坚信的主义”与“优美的艺术”统一的典范，表现出了诗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华 中 人 民 的 长 城”——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碑文敬读

□ 张凯昭 岳 亮

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碑，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建军广场中央。纪念碑由基座、塔体与新四军骑马战士塑像三部分组成，塔体高度10.12米，代表新四军的建军纪念日10月12日。骑马战士手握缰绳，身背抗日战争中标志性的大刀，坚定地面向前方，象征新四军义无反顾东进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铁军精神。

纪念碑的正面刻有张爱萍上将题写的“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碑”，背面西侧为纪念碑文，全文如下：

光荣的新四军，原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培育和领导的一支英雄的人民部队。这支部队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坚持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湖北汉口成立新四军军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新四军在皖南集中整编后，即由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又率领第一二支队北渡长江，赢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旋与黄克诚同志率领南下的八路军在盐城以南胜利会师，开辟了以盐阜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国民党顽固派以加紧推行反共政策作为对日妥协投降的重要步骤，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肩负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针锋相对，庄严宣告：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同年一月二十五日在盐城正式成立新的军部。人民群众热烈欢呼，敌、伪、顽军心惊胆丧。刘少奇政委、陈毅代军长运筹于陋室茅屋，奔走于芦荡沼泽，忍饥寒、沐风雪、入枪林、出弹雨，发展人民武装，扩大统一战线，加强民主建政，努力生产建设，创办文教事业。广大军民在反“扫荡”、反“清乡”、反伪化、反蚕食、反摩擦的斗争中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粉碎了顽固派的投降逆

流，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到日寇投降为止，新四军已由一万多人发展到三十多万人，作战二万二千多次，歼灭敌、伪、顽军四十五万多人，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纪念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直接领导的英雄的新四军和革命先烈，激励后辈，继续长征，特于盐城市中心建塔立碑，昭铭业绩，其辞曰：

英雄铁军，始建汉口。赖党缔造，人民哺育。光荣北伐，四海威扬。孤军奋战，罗霄山上。风烟南国，艰苦备尝。抗日救亡，大旗高张。皖南奇冤，反共猖狂。重建军部，誓缚天狼。莽莽海疆，浩浩龟场。将星云集，万众慨慷。政委少奇，勋业辉煌。雄才大略，陈毅军长。江淮河汉，纵横决荡。砥柱华中，铁壁铜墙。旭日东升，乐奏万方。铭文勒石，千秋共仰。

碑文介绍了新四军重建军部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以热情的文字赞扬了党领导下的新四军部队光荣的抗日功绩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皖南奇冤 神州共愤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抗战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设于湖北汉口。新四军组建不久即毅然挺进敌后，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倾向增长，不断制造军事摩擦。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要求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9日，蒋介石强令新四军北移，

次日又密令国民党军围歼新四军。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行进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8万余人优势兵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奋战7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然而荒谬的是，蒋介石却于1月17日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不屈不挠 顽强重建

中共中央在接到新四军被围攻的电报后，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13日，新华社向全国播报新四军被围的电讯。17日，周恩来深夜为《新华日报》悲愤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20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袭击新四军、破坏统一战线的暴行。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1月23日，新四军将领向全国发布就职通电。25日下午，以原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的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隆重的重建大会。刘少奇宣读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和任命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和通电。陈毅发表就职演说：我们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重建后的新四军共9万余人，继续在长江南北坚持抗战。

铁军新生 再创辉煌

新四军重建军部，对新四军而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铁血雄魂 王泰吉

□ 刘秉政

大地振奋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扩大了抗日影响。7天后，王泰吉率义勇军向三原进发，途中和前来“围剿”的孙友仁部遭遇，激战多时，部队被打散。王泰吉率百余人突出重围，到达照金革命根据地，受到陕甘边区党政领导人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的热烈欢迎。耀县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有力鼓舞了西北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为壮大陕甘红军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少胜多，威震陕甘。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召开陈家坡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根据陈家坡会议精神，王泰吉决定在陕甘边境开展游击战争，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泰吉率领红军出击作战10余次，旗开得胜，人心振奋，巩固了根据地。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新一轮“围剿”，红军主力主动离开照金，北上陇东，决定长途奔袭合水县城。合水县城是一个跨山城池，形如葫芦，最高点的山头叫葫芦把，筑有坚固的碉堡。10月15日晚，红军兵临合水县城。王泰吉综合分析了敌情和地形后，决定采取偷袭的办法，挑选出20多名机智勇敢的指战员，组成登城突击队，冒雨到达预定爬城地点。王泰吉命令突击队架云梯登城墙，突击队员柴正祥在云梯太短的情况下，采取攀爬的方式登上城墙并抛下绳子，后续突击队员们争先恐后

抓住绳子登上城头，消灭了碉堡里酣睡的一班敌人，其他突击队员占领东城门楼。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鏖战，红军胜利占领全城，打开监狱，解救被敌人关押的革命同志和劳苦群众80多人。红军游击队威名大震，陕甘边区贫苦人民欢欣鼓舞。

10月27日晚，刘志丹、王泰吉率部队在毛沟门作短暂休整。10月28日拂晓，国民党军趁机由毛沟门西辛家沟、南侧山岭两路袭来。刘志丹和王泰吉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到北山，抢占制高点，控制有利地形。当敌人一窝蜂似的向山上涌来时，王泰吉手提驳壳枪高喊：“敌人已经追击我们好多天了，今天我们一起冲锋把这一股敌人消灭掉！”当骄傲的敌人进入红军埋伏的地方10米左右时，王泰吉大喊一声“打”，急促的冲锋号随即响起。王泰吉一跃而起，挥手高喊：“跟我来，冲啊！”霎时，埋伏在草丛中的红军战士一齐跃起，犹如猛虎下山，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退下山去，后面的敌人不战自溃。毛沟门战斗，红军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共毙、俘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缴获大批弹药和其他物资。从此，陕甘边红军英名远扬，威震陕甘。赵文治团经此一战，一蹶不振，再未恢复团的建制。

勇赴敌营，壮烈殉国。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召开包家寨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



言不啻为一次新生。皖南事变血的教训让广大指战员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本来面目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重新理顺了指挥关系，恢复了红军时代的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健全了各项政治工作制度，正确地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新四军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新四军重建军部，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重建军部、坚持抗日，一方面在政治和宣传方面主动出击，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浴火重生的新四军在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粉碎了日、伪军近百次大规模“扫荡”，自身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被毛泽东称为“华中的人民长城”。

任参谋长。12月，红四十二师主力南下帮助三路游击队建立根据地。行动中，听说山东“人民军”刘桂堂部近万人开到豫陕边境。为扩大革命队伍，王泰吉要求利用旧关系去豫陕边说服刘桂堂易帜抗日，用他的话讲，就是“出去放一把火”。刘志丹考虑到安全，建议不要冒险。王泰吉认为他有许多老同志、老部下，搞兵运工作比较有把握，决定亲自深入敌营，劝说刘桂堂起义。

1934年1月上旬，葡萄沟门战斗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开到合水太白休整，红二十四师党委在连家砭召开党委会，同意王泰吉辞去红四十二师师长职务，离开部队去搞兵运工作，由刘志丹接任师长。1月底，王泰吉改装易服，秘密从师部出发，途经合水、宁县、耀县、铜川等地，于2月15日到达淳化强家山。当夜，在淳化县通润镇被旧相识、三区保安团团长马云从出卖、拘捕。在拘留室的墙壁上，王泰吉留诗感叹：“二十八岁空蹉跎，为谓故人入网罗；狐狗结交吾有愧，悬晴待看事如何。”

不久后，王泰吉被押送到西安。临刑前，他大义凛然，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命诗：“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胞泽千里外，梦魂应寄客愁容。”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英勇就义，年仅28岁。

革命英烈谱